

汕头文史

(第一辑)

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目 录

“潮汕七日红”前后回忆片断·····吴华胥 (1)

从《平江潮》到赤花剧社·····马毅友 (3)

忆汕头青抗会

——记抗战初期活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支左翼

青年突击队·····罗 林 (12)

解放前的汕头海关·····王琳乾 (39)

拓荒者的道路·····张华云 (60)

辛亥革命时期潮汕报刊一隅·····鲁本斯 (62)

旧时代潮汕的新闻界·····杨 勉 (65)

汕头同文学堂始末·····杨 勉 (69)

记解放初期汕头的一所航运学校·····沉 思 (75)

蒋帮的“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黄伟斌 (80)

蒋帮的“总统特派战地视察组及战地视察官”·····黄伟斌 (83)

“潮汕七日红”前后回忆片断

吴 华 胥

一、惠来的革命风暴

大北山在咆哮，韩江水在翻滚。一九二七年“四·一五”事变以后，广东城市笼罩着白色恐怖，像黑夜一样地沉寂。革命的队伍集中在山区农村。是年六月，我在香港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回家乡惠来县参加武装斗争。因被叛徒告密被捕后，由亲友营救，托病出狱就医，即潜往大南山，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往西区属农村组织农民武装，以坑仔村为据点。这里接近陆丰县，农民群众在海陆丰革命浪潮的影响下，革命热情高涨，一呼百应，不到半个月就组织起三百多人的队伍。虽然他们的手中只有落后的武器——双刀与尖串，可是战斗精神十分激昂。在第一次进攻西区堡垒隆江镇的时候，一举冲过隆江南面的溪西桥，使拥有新式步枪的警兵数十人闻风溃退，我队伍迅即长驱直入，所有敌机关人员逃走一空，我们以农民团队名义张贴安民布告。接着据探报知敌人向县城要求派兵增援，我们队伍即退回农村。至夏历七月上旬，我们接到南昌“八·一”起义红军已经南下潮梅这个喜讯，大家欢欣鼓舞，准备扩大战果。当时神泉区属五乡盐民协会长期受到驻神泉镇的盐场知事的压迫，派代表到坑仔村要求我们农民队伍开往神泉，解放神泉镇，惩治压迫盐民的盐场知事。我们召开农民武装队伍大会，征求大家意见，得到热烈赞成。九月中旬的一天，我们乘月夜向神泉进军。队伍经过五乡，全乡盐民列队在村外欢迎。我们团队长向盐民们报告“八·一”起义军即将到达潮汕，解放我们的家乡，群众欢声雷动。开完会，队伍进入神泉镇时，天边已现鱼肚白色。我们了解到区署拘留一些犯了所谓“陋规”的劳动人民，即打开拘留所，全部释放。然后派出宣传队到海边广场，宣传农民武装是为了解救人民，使人民不再受压迫而组织起来的，绝对不拿人民的一针一线。

队伍进入神泉镇的第二天，接到汕头专程送来的情报：“八·一”起义军已经进入汕头。大家欢欣跳跃，奔走相告，马上紧急集合，商议派人到汕头与起义军联系，以便下一步进军惠来县城。大家一致推举我做代表前往。当天我带着保卫员蔡贡同志起程，途经东区径口关时，由从汕头来的旅客得知消息：“八·一”起义军九月二十四日占领潮汕，九月三十日撤出，沿潮阳、普宁方向转移。再多次询问其他的汕头来客，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我认为，只有转向潮阳的两英圩或者普宁的流沙去寻找已撤退的队伍，才能了解起义军的去向。下午

四时左右，我们到达两英圩，很幸运地碰到两位掉队的起义军政工人员，才知道大部分队伍已向海陆丰方向撤退，还有部分队伍进入大南山与地方农民武装配合活动。同时，我在两英圩碰到鹅地村农会负责人彭德安同志，他告诉我们，农村地主武装集团正配合国民党部队到处搜捕起义军的掉队人员，我们必须立即离开圩镇到大南山小村庄暂避。当晚彭同志带我们三人到一个基督教礼拜堂借宿。第二天凌晨又带我们上大南山，到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龙潭一户农民家中借宿。我要求彭同志到惠来农村寻找农民武装的领导人，以便加强联系，互通情报，并指导他们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彭同志在农村联系队伍，还从县城我的岳父那里带来一封信，是“八·一”起义军的领导人路过惠来城时写的。信中称我为惠来县长，要我同他们互通情报。可惜接到这个消息已经过了三天了。当时我跟起义军的两位政工人员商量，他们主张设法到香港去。

二、同郭沫若同志赴港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我由亲戚找到一艘木帆货船，从神泉开往香港。同乘这艘船的有郭沫若同志和他的秘书汤慕兰同志。在船上和郭老晤谈，才知道“八·一”起义军撤离潮汕的一些情况。他说，周恩来同志在南昌起义沿途指挥、策划军事行动，因操劳过度，到达汤坑时就发高烧，但他仍坚持继续长途行军，抱病指挥作战。郭老谈到，就目前形势看来，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的。他打算再到日本住几年，专心写作，着重反映辛亥革命以来的几个革命历史阶段。到达香港时，我带他上岸，住在鸿安旅社，即日下午，香港党组织派吴焕珠同志来同我们联系。翌日，郭老和秘书汤慕兰同志发现叛徒李合林也住在这间旅社，马上迁往别的旅店。我和另外两位政工人员则移住在铜锣湾同学家里。不久，郭老就乘轮船离港赴上海去了。

三、海上遇盗

一九二七年十月，郭老和他的秘书汤慕兰转往上海，其余两位政工人员也先后离港北上，我在党组织指示下暂时留港等待分配工作，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省委书记赖玉润派我和方达史、林国英两位带同其他由内地来到香港的十多位同志，雇一小木船从海路往陆丰甲子港，准备在那里秘密登陆，潜往大南山，联系彭湃同志领导的队伍，协助大南山老根据地的工作。不幸，木船开出不久，经过惠阳县沃头镇以南大约五十里的海面，就遇到一条海盗船。海盗们手执长矛拦住我们去路，叱令船夫降落风帆停止行驶，两个海盗跳过船来，首先抢夺我们各人携带的衣物，最后选择我和我的同乡黄振德两人作为绑架的对象，勒令我俩上海盗船，然后命令我们的小船扬帆离开，海盗船就驶往一处海湾停泊，开始审问我们的籍贯和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汕头专署文化局、汕头市文化局组织潮、普、惠文化艺术界部分同志，深入老苏区大南山调查革命史料。本文就是根据当年的调查访问记录并收集有关戏剧方面的材料整理而成的。

一、《平江湖》一剧的诞生

一九二八年末到一九二九年初，中共潮阳县委的领导同志，逐步由一、二人到大部分人从大南山上转移到平原第四区和平下寮乡开展地下斗争。这里地处练江下游，又靠近龟

从《平江湖》到赤花剧社

马毅友

头海，早造阴雨连绵四水归，田园受浸失收；晚造插下不久闹天旱，又有失收的危险。全乡连毗邻村共两三万人，个个心中焦急。这时党若能领导群众起来抗旱保收，就可牵一发而动全身（县），其关键就在于把流入练江中流的大南山水，从古溪乡开闸，改道把水引到和平乡来。因此，县委决定因势利导，发动群众起来斗争。

县委主持油印工作的卢世光同志（普宁洪阳镇人）隐蔽在离和平乡六里的石尾岐。卢以前是搞武的，却能根据县委“借水抗旱”的意图，写了一支潮剧小演唱，名叫《×××自杀得救》。说的是

家庭情况。我们推说是农民，这次同其他同乡到广州探视在广州做工的兄弟，现在打算回陆丰县乡下去。海盗听后说：看你们的样子是商人，不是农民，你们应该马上写信叫家人筹款来取赎，不然的话，勿怪我们走江湖人无情！我们再三同他说情，说写信到农村去是筹不到款项的，只有放我们一人到广州找亲人或许可筹一点钱。整整谈判了一个晚上，开始他们提出每人赎款港币二百元，最后减为一百五十元。后来，他们要放黄振德同志先回广州筹款，黄推说他无把握，最好让我先回去筹款。结果，在被绑架的第三天，一海盗另划一小艇送我到沃头镇，带我到一间造船厂去找一位职工，交代我筹到款项就带来这里交给这职工转交他们。接着就带我到轮渡码头乘船往香港。我到香港后，将情况报告省委，同时转知黄振德在港的亲戚发电报去告诉他的家人，筹到港币三百元后，由黄振德的亲戚带款到沃头去。大约过了半个月，黄振德才回到香港。那十几位原船回来的同志不久就派往广州工作，后来多数因为地下机关被破坏而被捕牺牲了。

贫农某某，因天灾迭来，被迫要在大树下上吊。正当他唱着“手执七尺无情索，随我上吊到阎罗”之时，适逢一位青年工人经过，连忙上前劝阻，指出革命自救才是真正的出路。各处“闲间馆”一唱开，群众听后有如天开眼。

宣传部长林锦梅（澄海人）所写的潮剧本《平江潮》就在此时诞生。他以地名暗示“平江起义”的影响，故事本身则写潮阳平江县财主钱大元下乡到赖启仁家中逼债，赖因军阀混战增捐税，加上天旱无收成，无钱可以还债，合家跪求宽缓无效，钱要动手抢赖女玉珍去做二房，赖家起来反抗，还要将他伺屎。钱逃脱后请兵报复，逼得赖家离乡求乞，启仁本人则当挑工度生，幸遇共产党人朱心赤对众宣传，启仁听后报名参加革命。全剧以启仁与心赤约定参加年关暴动而告终。此时“借水”正在酝酿，剧本一发出，四乡六里传唱，从而形成一股推动斗争的动力。后来虽没有出现如剧中所说的年关暴动，却在“借水”抗旱保收后掀起了抗租抗债、带动四邻、震动全县的“练江潮”。随着敌人大兵的镇压，《平江潮》一剧，也被县委带上大南山了。

二、大南山区的戏剧活动

大南山原由潮、普、惠三县分界领导，潮阳部分约两万人，分为五、九两个区，县委驻在五区的牛角丘。

上一年秋，在离两英圩十三华里的潮阳小莫斯科——林招村举行全县农代会时，在联欢会上，红军军医梁鸿芳（广西人）演唱了一支粤曲，东委宣传部长萧向荣演唱了用“毛毛雨”小调填写的革命歌：“思想起，前年的广东，思想起，广州的暴动；工农兵，勇敢向前冲！哎哟哟，向前冲！冲锋啊，你倒我又来，建立起政权苏维埃。哎哟哟，苏维埃！……”也有人边唱边演的，如：“劣绅坐落颈缩缩（纠缠），抹下鼻烟掣下须（秋），盘起脚来答答动（冻），咳（勘）起嗽来生死（弥）抽。食饱无事坐书斋，吸吸（巨，）水烟喝（哈）烧茶，拈拈算盘消公数，经心经事经枋枷……”这首顺口溜，每句都有形象和动作，单人演唱起来，就象一出“独脚戏”，但还不是台上戏。

从小演唱发展到舞台剧，是在一九三〇年“二七”纪念日开始的。戏台搭在牛角丘一棵大榕树下，演员由党、团县委、五区区政府和红军医院的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大多数做过群众工作，又都识得一些革命歌曲，当面一凑合，定个戏名，晚上一登台，就是“无师自通”的演员了。林锦梅、周大林（县委秘书，海丰人），在《二七案》中扮演施洋、林祥谦，把“头可断，肌可裂而工不可复”的革命精神演得真切感人。县委书记陈开芹（潮阳大长陇人），在批判旧教育的一出戏中，扮演一个老八股先生，把人物刻划得维妙维肖，使人感到苏区的教育必须着手改革。梁鸿芳在一出反对买卖婚姻的多幕戏中，扮演被迫上吊的女主角，为苏区实行男女婚姻自主敲响战鼓。

五、九两区分片在重点村各演一夜，四邻小村就近观看。不上一星期，每个苏维埃公民基本上都看了一次。同志们白天照常工作，晚上登台演戏；有事来县、区委联系工作者，顺便看看自己的赤派戏。“无箫无弦靠情切”、“事未见过印象深”！……大家看到领导同志能武又能文，都说“将来一定得天下”！

三、从白话剧到赤花剧

一九三〇年秋，闽粤赣边区成立时，邓发任边区特委书记。为执行党中央这个决策，两广省委书记李富春与邓发从香港同到大南山，办理移交和指导开会。东江特委和有关单位已预先由丰顺八乡山南迁。潮普惠合为一县，大南山合为苏维埃特区。领导机关开头都驻在潮阳九区大陂村一带（总称为石船社），附近的赤竹丘被辟为红场。在有邓发夫妇等莅场的县苏代表会的联欢晚会上，从苏联留学归来的董良史，斜戴毡帽，袒开胸襟，手持酒樽，踉跄上场，口唱俄国歌，表演一出名为《醉汉》的独脚戏，为文娱增加新节目。人们虽听不懂，也觉别开生面。

大南山内很难看到潮剧，石船社一带，只有一次在赤竹丘搭台演过“师公戏”，（由众和尚念经办完功德后转而演唱潮曲的班子）最热闹的一次是大溪坝和石狮都各演一台“皮影戏”。此时因分配土地，人民生活改善，一支三十人的白话剧队（当时人们称话剧为白话剧）应运而生。人民有了自己的演剧队，全区性的戏剧活动从此开始了。

当时演出的剧目，除象“二七案”这样的多幕剧外，基本是反映现实斗争的独幕剧。群众提出：“白派说白派话，赤派说赤派话……”白字犯忌，白话剧就改称赤话剧。

一九二八年春起，彭湃同志曾到大南山领导工作约半年，指出群众喜爱的娱乐形式应发挥其作用。惠来县委派在八乡林工作的刘育民同志，见林樟村有一个“清唱班”，打鼓先生名林松，曾卖身在“老玉堂”班当乌衫，有唱、做、唸的功底，育民就把它改为农民俱乐部，由村人林金潭当主任，增加一些革命歌曲和小演唱。

离林樟二十里的盐岭村（是惠普私盐集散地）有个名叫朱林发的，曾在“中元华”班教戏，他回家后组织的清唱班也模仿林樟的做法。群众不满足于看话剧，经东江特委同意，在举行李、卢、列（即李卜光、卢森堡和列宁）纪念周之时，请这两个俱乐部来红场参加演出，前者演《临江楼》，后者演《食红杏》。事后就从中吸收十九人进来。原有的旧剧目，剔去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戏剧改革从此开始。自是以后，晚上十时前演话剧，十二时前演潮剧。

人增剧目也增，剧队改为剧社。群众又提出：“革命是会开花结果的，赤话剧社不如改为赤花剧社。”剧社的名称，至此就定下来了。

红场上赤花剧台的屋顶盖后被烧，烧后又盖，敌再烧，我再盖。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春，盖茅草顶；敌军来烧后，我改盖铁皮顶，敌军又把铁皮烧成铁块，我便改盖成钢筋水泥的了。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红场举行纪念广州暴动四周年演出，剧目中出现张太雷同志领导广州暴动的光辉形象。人们感奋之余说：“若在这些革命戏中唱出潮音歌曲来，那就更合想了。”于是，剧社同志就找林锦梅要《平江潮》剧本，并商量为适应演出内容予以充实改动。剧本情节虽比较单薄，却是党运用潮剧这个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思想内容的开端。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在盐岭村演出时很热闹，那些从惠、普平原来做私盐交易的，也留下来看赤派戏。这一回舞台两边挂出一付对联，据林松伯回忆，这付对联是四句二十八字：

赤旗飘扬大南山，花灯××临工农，

剧烈推翻旧世界，社会主义定实现。

“花灯”后面所缺两字，有人估计是“鼓乐”，有人料想是“灿烂”。以“赤花剧社”冠于四句之首则属无疑。

一九五一年杨修之同志随中央老苏区慰问团进山时，在林樟山洞的一批革命文物中，发现一首油印的《工农剧社社歌》，可能就是“赤花剧社社歌”。现将该歌全文照录如下：

5 1 | 1 2 3 2 | 1 7 6 | 2 2 2 1 | 7 6 5 | 5 5 5 4 | 3 2 1 | 5 6 |

我们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
创造工农大众的艺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

6 6 6 | 5 4 5 | 3 — | 5 6 | 6 6 6 | 5 4 5 | 3 — | 1 2 3 2 | 1 7 6 |

旧社会的黑暗面，指出新世界光明伟大，题材与故事英雄
旧社会的黑暗面，指出新世界光明伟大，题材与故事英雄

2 2 2 1 | 7 6 5 | 5 5 5 4 | 3 2 1 |

出在工农革命赤色革命的战士。
出在工农革命赤色革命的战士。

四、剧社的组织和剧目简介

赤花剧社成立后，刘育民（潮安人）当主任，莫杰（海丰人）抓宣传，朱荣（海丰人）任秘书，蔡宗江（惠来坑仔人）当总务，陈香莲（惠来岐石人，后嫁北溪村）当演员、宣传员兼化装（一说还有潮阳潘岱村的莲弟、秋弟协助梳头）。为做好演出点的群众工作，还配有一个宣传队：白天分散到演出点和附近村庄做工作，方式有口头讲、笔写、绘画和歌咏等。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三月，我与工作组（由汕头和潮阳文艺界组成）进山工作二个月，汕头市同志曾在惠来圆墩村盛德公祠的墙壁上，发现由剧社署名写的十幅革命标语。

剧社全盛时约六十人左右，一月每人伙食费六元，零用钱一元半（一说是二元）。每人

发纸雨伞一支，布鞋一双，纱内衫一件，不夹棉的短袄一领，生活待遇是平等的。布幕、汽灯、道具自己带。每到演出点，就动手协助搭戏台，驻地轮流放哨，作风是耐劳刻苦的。日间抽空访贫问苦，帮助群众搞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四名负责干部中，刘育民晚上除协助讲解剧情，还在《平江湖》一剧中代林金潭扮演朱心赤。莫杰日间绘宣传画，晚上主持台前宣传，还曾在一次反迷信的剧目中当主角。若在群众中发现好题材，立即碰头编戏（或快板），当晚上台演出。可说是一支“队中无闲兵”的战斗队。

工作组在调查访问中，对当时赤花剧社的剧目，多数知情人都说是共有三十多出，我们调查到的，只有二十七出（潮阳县委演出的除外）：

1. 传统剧目有《临江楼》、《双玉鱼》、《滴水记》、《食红杏》四出。

2. 无文字本的多幕现代剧，有《三七案》、《广州暴动》两出。

3. 有文字本的《平江湖》一出。

4. 反映地方群众要求及时配合工作的短剧二十出（无文字本），下面就是这二十出短戏的简介：

（1）佚名（儿童戏）。一个拾粪的穷孩子在巷口砌起“官灶”，一富家儿嫌他阻路，一脚将它踢倒。穷孩子上前质问，富儿又嫌粪臭，正要起脚踢去，穷孩子握紧手中粪耙先下手，他个子虽瘦小而有力，把虚胖笨大的富儿击败了。

（2）《骗先生挨蓆》：某教育界败类，覬觎一学生之母，学生之父敦子骗先生抵家后，便来敲门。母叫这“老师”剃须包头，代她挨蓆筛米。父入，问包头布者是谁，妻说是邻妇来帮工的。父佯信之，让这“邻妇”紧张劳动了一天。不久，父又命儿去请这老师来，此人闻而搔首说：“你家米已吃完，又要叫我去挨蓆吗？”

（3）《半打死人》：六个坏人混入庵堂，一当主持，余当和尚。常借汲水之名到井边调戏妇女。某见而恨之，不料自己的妻子也被调戏，其教妻把五个和尚引到家中，他就来敲门，其妻将群秃藏入大柜中，夫进门，坐在柜上，装作有木虱咬人，命妻煮水烫死柜中人。一仵作被邀来收尸，说定尸收完才付工钱。当仵作把第五个尸体抛落粪池时，适来上厕的主持被惊起，仵作乘势把他推入厕中说：“若非我脚手快，你一滴走，我就拿不到工钱了！”

（4）佚名：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红场举行纪念广东广州暴动四周年演出时，留苏归国工作的朱炎（湖北人，军校校长）、董良史（海丰人，军校教官）、陈荣（广州人，海员工人，军校教官）等人上台跳俄罗斯舞，边跳边唱俄国歌曲（但不知舞蹈名称），观众感到别开生面。

（5）《人不如狗》：一穷人走过危桥，失脚跌落河去，呼救无人理睬！接着一富人牵狗过桥，狗跌落河时，狗腿、亲丁争相落河救狗。

（6）《盲人娶哑妻》（同剧《青盲娶哑奴》）：一个哑女凭媒嫁给一个盲人，过门之后，闹了很多笑话，揭露买卖婚姻的害处。

（7）佚名武打戏：某乡演戏，热闹得很。伪乡公所官兵藉名到场维持秩序，从中调戏

妇女，激起乡民的反抗，当场将其打败。运用武功对打，演了一出全武行。

(8) 佚名：某婆婆把媳妇说得百无一是，逼儿将她改嫁。凭媒另娶一个，谁知新媳妇贪食懒做又刁泼，将婆婆百般虐待。教人明白婆媳之间，应互助互让，勿听媒婆挑唆。

(9) 《神棍现形》：一神棍装神弄鬼假显圣，使不少人受骗。识者当场用妙计使他技穷，逼得他在群众面前出丑，教人不再上当。

陈香莲口述二出佚名戏：

(10) 其一、某家四口，方华平（惠来县城人）扮婆婆，香莲扮媳妇，兄弟砍柴烧炭为生，兄去卖炭被抢，弟落田抢番薯根充饥。正当全家愁苦之时，一位革命同志上山慰问，并解释痛苦是反动派造成，于是全家参加革命去了。

(11) 其二、香莲扮演穷家女，被地主借口父母欠债抢她去做二房。受尽大婆虐待，地主回来，稍加按束，地主出门，更受虐待。某女同志对香莲指出妇女解放之路。她觉悟后便去带革命队伍来抓地主，并就此入伍去了。

下林樟村林惜同志（解放后当过乡干部），口述她当年看过的九出戏，其中七出佚名：

(12) 其一、婆媳接到侨批，到门外请一衣冠楚楚者来，媳煮甜蛋款待后，婆出信请他代读。此人不识字，连声说：“惨惨惨，死死死！”婆媳误作儿子（夫婿）死了，大哭起来，适一荷锄农夫经过，入内拿侨批一看，说：“你们的儿子（夫婿）健在，还寄来四个龙银呢！”婆媳转悲为喜，那外表好看而目不识丁的人惭愧地溜走了。

(13) 其二、两个穷孩子带着“番薯箍粥”去烧炭，因家中只有一顶葵笠而争吵，地主上门讨租来了，穷兄弟说家中无米，地主打开粥篮盖，把番薯箍当作猪脚节，便说“既食猪脚粥，怎么说家无米？”踢翻粥篮，限期还租而去。两兄弟蹲地拾薯充饥，齐声痛骂地主不止。

(14) 其三、盲叔叔闻乡中强人调戏纺纱的嫂嫂，教嫂把他诱来自当有法治之，但嘱嫂临事要坚决。嫂答“我一定坚决！”是晚嫂引强人到，叔邀另一盟友回来敲门。嫂依计用被盖住强人，两盲人入内把强人用被包紧，割去他一耳。这强人到苏维埃政府控告无效，还被判刑惩罚。（阿最扮嫂嫂，宗本（揭阳人）扮叔叔，林芝（林樟人）扮盲友，林福扮强人）

(15) 其四、林一史（海丰人）扮老妇，手捧盛供品的竹筛到巷口，说了许多求神保佑的愚话。莫杰扮“硕（精）仔”，带一群顽童到，吃尽供品，食后人皆平安，说明神鬼无灵，勿受欺骗。

(16) 其五、林一史单人表演唱：“劣绅坐落颈缩缩（纠），抹下鼻烟拏下须……”（详见上文）边唱边比，刻画剥削者的丑态，引人对土豪劣绅的仇恨，激发斗争的决心。

(17) 其六、《和睦家庭》：兄弟三人，一商、一士、一农，议论家计时重男轻女，三妯娌商量教夫之计。当三兄弟集合之日，她们依约表现了治家少不了女人，有些事情是男不及女，使三兄弟折服。承认男女应互相尊重，各显所长，家庭才会和睦。

(18) 其七、《镜中人》（笑剧）由子伟、宗本（皆揭阳人）两人扮演甲、乙，台中置

一个大镜，两人各站一边，各扶一碗在手，甲碗盛水，乙碗盛墨，甲比划，乙跟着比划，甲脸如故，乙脸变丑。乙知上当，起而攻之，双方格斗，镜破戏止。

(19) 其八、其子参军母心焦，巫婆乘机造谣。母请她到家落神问凶吉，巫婆为诈骗钱银，说其儿久无音信，是在阵中身亡。谎言未了，其儿已告假省亲归来。

(20) 其九、佚名哑剧：几个AB团分子在密室开会，适一革命同志带队到，彼等临急装成室内的桌椅、盆架和衣挂等。我革命同志细察后，发现其破绽，一网将其打尽。

据说还有涉及华侨问题的剧目，可惜还没有纪录出来。

上述短戏有一些是从旧戏和话剧变过来的，有不少是为适应当时既无电光，又无座位以及人挤嘈杂的环境而编的。如笑剧《镜中人》、哑剧《抓AB团》、闹剧《盲人娶哑妻》和官逼民反的全武打等等，远观动作便知其内容，又为其情节所吸引。既照顾山区的观众要求，又克服了上列存在的客观困难。加上戏完就有人讲解，加深观众对剧目主题思想的领会。

五、边演出边战斗的轻骑队

当普宁县苏区分水、锡坑一带的群众正在畅谈赤花剧演出的佳话时，驻在潮阳两英圩的白军，就听到只隔一重山、相隔八里地的圆山仔来了赤话剧。据当年剧社演员朱凤鸣（盐岭村人）回忆说：“我们上台化装后，敲响了锣鼓，红军便去两英的山上打埋伏。两英乌龟壳里的白狗就如蚁闹腹爬出来‘送命’。只听枪声一响，剧台上的演员，立即变成战场上呐喊助威的战士了。”

“大意失荆州”，赤花剧社回红场演出时，因陇头坑赤卫队失哨，被惠来城白军直扑红场。临急大家约好分头到下林樟会合，途中遇大风雨，次日才到达目的地。休整了七天又步行三十里，到惠来界圆屯这个大村演出。为配合红军解放惠来葵潭镇（潮、惠两专区的要冲），又须远行演出了。汕头的同志在发现上述赤花剧社那十幅标语时，又在“敦厚公祠”的墙壁上，发现墨写的八个大字：“别了圆屯，到达葵潭。”

当红场赤花剧台正要第三次盖建屋顶时，白军以为又要演赤花剧了，就要出奇兵奇袭。红军立即出谋献策，在剧台两边做了两尊泥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红毛鬼，泥人脚下都缚着地雷。戏台上下空无一人，红场四周鸦雀无声。此时：

“一支匪军，‘应命’赶来串演司马懿，

勒马但见台上一双泥人侍两旁，

右边跪着蒋该死，

左边缚的是红毛绿眼穿西装。

远观似人匪兵争射击，

近看方知开罪主子共靠山。

匪首忍气下令先解泥人蒋，

触动地雷群狗尸飞天。

红毛鬼仔吓得光瞪眼，

幸存的匪众争奔呼爹娘。

“空城计”演成“火烧葫芦谷”，

剧社挥笔又把新戏编。”

（见《汕头日报》1963年6月23日《赤花史》专页）。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东江特委给两广省委的报告中有一段话这样说：“不过特区委组织还不健全，领导力量太差，特别是五个常委中，一个负责区政府委员长，一个在赤花剧社工作，二个不能脱产，只有一个新提拔的是脱产的。”可看出特委当时对剧社工作的重视，从而使这个队伍的战斗性表现得很好。

六、离开剧场走上战场

一九三二年三月间，蒋匪军徐景棠部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率领该师匪军，与潮普惠地方团队以及地主恶霸返乡团，颁布“搜索、烧杀、游击、封锁”的八字令，分路合围，全面血洗大南山。忠于革命事业的赤花剧社全体演职员，响应东江特委“反清乡保果实保政权”的号召，于同年三月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向党立下庄严的誓言：“离开剧场，走上战场！”

以前在红旗飘扬中大显身手的赤花战士，投入炮火连天的斗争之后，少壮者挥戈上阵，参加宣传队的女同志，也活跃于前线和敌后，其中一位名叫碧华（海丰人）的，后来成为“八女就义”中的英雄。他（她）们的英雄事迹，鼓舞着整个东江区的革命战士。

方华平、方裕兴（即方小川）等虽叛党投敌，仅占赤花成员的三十分之一，绝大多数的人都在严峻的考验中，成为顶天立地的好汉。被称为能写能弹能唱能演的刘育民（他可能是东委在向省委报告中所说特区五常委中那个在剧社工作的常委），在《平江潮》中扮演朱心赤时出台所唱的前两句：“只为革命不顾身，人人极有牺牲精神”，在战斗实践中成为自己的誓词，壮烈地在与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来自红军又回红军去的莫杰同志，在重伤被俘受审时，踢翻惠来伪法庭的案桌，痛骂蒋贼祸国殃民，然后从容就义！

国民党刑法上规定：未满十八岁的政治犯不杀。当我们在雷岭公社羊公坑访问时，该村陈元盛同志说：他和赤花剧社三个小演员在惠来同监，那当乌衫的二十岁，当小生的两个才十五岁，按律后两个本可免死，因他俩在监中演戏给难友看，上法庭又用骂贼的唱词骂法官，结果都被杀害了！

盐岭演员朱丙金，回乡后参加工作队，被捕不屈，慷慨就义于降江镇。在《平江潮》中扮演赖肩仁妻陈毛的林阿嫫（下林樟人）也在反围剿中伤了右手。更感人的是陈香莲同志，

在剧社时她被号为三员（演员、化妆员、宣传员），上战场后当战斗员，被俘受审不屈，敌人连续三次将她押上刑场假枪毙，她仍矢口不向敌人吐露只字。剧社歌中说：“艺术是我们武器”、“英雄出在……赤色革命的战士”。他（她）们真正是：舞台上革命英雄，战场上、刑场上同样是英雄啊！

七、发扬光荣传统，踏着前辈脚印前进

《平江潮》中朱心赤出台时所唱的后两句说：“万恶社会须打破，光明世界重创新。”这话果然成为革命前辈的预言，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潮汕区九县一市宣告全面解放了。

一九五三年，惠来城举行全县业余剧团汇演时，下林樟同志踏着前辈足迹，带着《平江潮》上县参加演出。在这个汇演本中，新增加了几个情节：（1）钱大元请兵到赖厝乡抄抢时，勒令众乡老缴交“花红银”五千元，归途遇红军伏击缴械；（2）白军再到赖厝乡实行报复，又勒令缴交“花红银”；（3）举行年关暴动时，赖启仁担任南路总指挥，惩办了为富不仁的钱大元，实现了心中蕴藏多年的宿愿。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下午，惠来县文教局张云、高基良等负责人，前往下林樟，我也同往。全村人口已由初解放时500人增至1000人左右。红军时代的俱乐部早已扩建成四十六人的业余剧团，一九五八年到隆江镇参加汇演时得了奖。当晚看了他们演《包公三勘蝴蝶梦》等剧目。当年的林松已七十六岁。还从普宁请一科班出身的中年人刘赛和来协助，连以前剧目共教了《借刀记》、《美人计》、《发土地证》等，还有《红娘子》、《辕门斩子》等传统戏出。逢年过节还被邀下乡到平原的钓石、览表等地作友谊演出。第二天，请林松伯和林继成等同志座谈《平江潮》一剧演出的往事，即席听他俩唱了两段原剧曲文，觉得发掘有望。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惠来文教局一同志与我前往，请林松伯与林继成、林金潭三位同志，从当晚起到二十六日晚八时半止，把各个人物的唱词、道白，逐段回忆，二十七日上午再次校对。其中某些段落的句子无法记全的，则参阅一九五三年参加汇演的本子，按大意补全之。当年演出时，概以下林樟的人马承担之，他们是：

林松当打鼓先生，林金潭演朱心赤，林继成演赖启仁，林墘演赖妻，林天龙演赖女玉珍，林瑶钱演赖子玉章，林添明演钱仆。每逢刘育民演朱心赤时，则由林金潭演钱大元，林添明改演钱仆。

当时记录出来的演出本，比一九二九年在家乡——潮阳和平乡看过的原作有如下改动：

（1）各段戏文标明二板、三板、转二板、转三板……使之成曲；（2）个别唱段，配上弦诗（如《粉红莲》），使之成词，以利于演唱，增强舞台效果。

下林樟的同志在戏剧战线上的经历已绵延了三代，由于得到党的领导，使光荣的革命传统不断发扬。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忆 汕 头 青 抗 会

——记抗战初期活跃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支左翼青年突击队

罗 林

前 言

抗战初期，南中国大门的广东省，曾经存在两个由党领导的公开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团体：一个是广东省委领导的，在省会广州组成的抗日先锋队，这是一个左倾色彩比较明显的青年组织，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在广州沦陷前的日子里，团结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起过一定的作用；另一个是当时的中共闽西南特委（以方方同志为首）领导的，在潮汕梅埔各地普遍组织起来的青抗会。它团结了潮汕梅埔城乡的广大青年，是一个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青年组织。它在宣传抗战，支援抗战方面；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配合党的地下斗争方面；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活动，打击地方反共黑暗势力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抗会的全称是青年抗敌同志会，（1938年1月15日以前，原名“青年救亡同志会”。）这个组织于抗战初期最先在汕头市成立，并立即成为潮汕各地青年组织的榜样，不到几个月，潮安、澄海、揭阳、潮阳、普宁等县青年救亡同志会也相继成立。接着，惠来、饶平等县也陆续筹备成立。稍后一点，丰顺、梅县、大埔、兴宁、五华等几个县的青年也组织起来了。青抗会组织发展的最盛时期——1938年1月，曾由汕头青抗会倡议，成立岭东青抗会总会，因为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承认，未能获准登记，而改为岭东各地青抗会通讯处。这个通讯处由杜伯深、徐杨、曾应之等同志主持，曾出版《抗敌导报》作为岭东各地青抗会的会刊。

汕头青抗会以它的组织与活动，为各地青抗会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它还通过它的分支机构——155师随军工作队和157师战地服务团、156师北上随军工作队的活动，对各地青抗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研究“汕头青抗会”的历史，是了解潮汕梅埔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把锁匙。本文就笔者所知的情况，对汕头青抗会组织与活动的几个方面，作一个简单扼要的回顾，由于所记述的人和事，距今四十多年，错误与遗漏，在所难免，希望汕头青抗会的老同志和了解汕头青抗会历史的同志，给予指正。

（一）汕头青抗会成立前的形势

抗战爆发前的一年，潮汕的革命形势，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潮汕党的地下组织，就在这个时期重建起来；1936年10月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义勇军。1937年1月，汕头市建立了潮汕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以后党的组织就在潮汕各地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活动，从汕头扩展到内地各县，成为整个潮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领导力量。

潮汕人民是富有革命传统的人民，早在北伐时期，潮汕人民就多次受到革命的影响，“八·一”南昌起义，贺叶部队下潮汕，这里的人民又受到一次革命的洗礼；土地革命时期，古大存红军游击队在这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也给这里的人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抗战前夕，饱经忧患的潮汕人民，以无限深情怀念共产党，潮安县的人民，更是日夜盼望着。在西都乡暴动受挫后撤退到闽南乌山的工农革命武装，继续坚持战斗。潮汕的民心普遍趋向革命，要求抗战，意气十分高昂。

汕头是一个对外的通商口岸，地处海防前线。这里的人民，历来受日舰日兵的欺凌，抗战爆发前的几年间，日、台浪人不断在市内寻衅闹事，当地人民身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许多热血青年，更是忍无可忍，与他们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沉重打击这些民族败类和侵略者，使他们不得不敛迹离境。潮汕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动人事迹，不论抗战前或抗战后，都对驻在潮汕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便是抗战前夕发生在潮汕地区的粤军155师李汉魂部抵制内战的事件。当时155师师长李汉魂、公开拒绝其上司陈济棠进行内战的命令出走香港，对粤军内部影响极大，成为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汕头青抗会的成立

汕头青抗会成立于芦沟桥抗战以后。芦沟桥抗战以前的汕头，完全是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爱国青年没有组织救亡团体、宣传抗日救国的自由。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甘屈服的青年，只能走秘密结社的道路，进行地下救亡活动。抗战前的一、二年间，汕头青年中的先进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地下的活动。他们在学校内外，组织各种读书会，提倡读禁书，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组织义勇军、地下学联，进行地下的救亡活动，组织各种文化团体、研究小组，制订和推行“潮州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简称“潮拉”）大搞通俗文化运动，提出“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的口号。这个时期，活跃在汕头地下救亡战线的著名人物，为数众多，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有领导“潮拉”运动的曾应之同志，搞通俗文化运动的王亚夫同志，组织和领导读书会的陈光同志，以及进步的中小学教师杜伯深同志，张望同志，林西园同志，学生领袖周礼平同志，还有王珉，林克清，王孟泽同志。此外，参加地下活动

的、还有方东平、方向明，王玉珠，王勖，陈莉，林如心等女同志。所有这些同志在汕头青抗会成立后，都成为它的主要骨干，担负着这个青年组织的领导工作。

汕头青抗会(原名青救会)于芦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8日发起，8月13日成立。那时抗战的形势迅猛发展，汕头的一切都在急剧变化：军民关系由疏远、对立变为亲密合作；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从地下走向街头，他们公开宣传抗战，宣传支援前线，并在防空、备战和锄奸方面与驻防部队积极合作，受到驻军的欢迎。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青年到抗日救亡工作中来，迫切需要一个得到各方面承认的，有合法地位的青年组织，汕头青抗会就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

汕头青抗会是一个进步的群众团体，是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的组织。它以抗战前夕在汕头市内秘密结社、进行地下救亡活动的爱国知识分子、民主青年和进步学生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爱国青年而组成。它一成立，就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吸引着广大的青年群众，成为一支旗帜鲜明的、充满活力的青年突击队。

汕头青抗会成立时，潮汕地下党重建还不到一年。由于潮汕梅埔党组织划归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闽西南特委领导，组织上大大加强，政治上也加快成熟。汕头青抗会在潮汕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抗战初期急剧变化的形势和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联络地方驻军，到驻军部队去教唱抗战歌曲，进行宣传，并欢迎他们的代表“指导”汕头青抗会的工作。这样就不但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也团结了驻军。驻军营部政训员张其光，经常给汕头青抗会的工作以有力的支持，使汕头青抗会能够击退来自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的种种无理阻挠与压制；也使汕头青抗会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得以顺利通过汕头市党部的审查，获准登记，团部政训员刘岐山也经常参加青抗会的活动，他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并指定教唱“枪口对外”这首革命歌曲。驻军各级政训员的一致支持，加强和巩固了汕头青抗会的地位。

汕头青抗会是一个左翼青年团体，但它一成立就依法登记，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它原名“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简称“汕头青救会”，这个名称和解放区的“青救会”、“妇救会”相似，很使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和国民党里的反共顽固分子感到可怕。1937年底——1938年初，《岭东民国日报》社长陈特向，汕头市税务局长谢镇南等反共顽固分子抓住汕头青救会和一五七师间的一个矛盾，妄图假手一五七师来打击汕头青救会。当时汕头青救会的王亚夫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一五七师在闽南制造“漳浦事变”，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引起一五七师团长张源的极端不满。为此，张源曾对支持汕头青救会的一五五师政训干部张其光拍案叫骂。这期间，反共顽固派不断向汕头青救会施加压力，以“解散组织”相威胁，并以“统一抗敌组织”为名，提出把“汕头青年救亡同志会”改名为“汕头青年抗敌后援会”，统属于“汕头市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以改名来达到解散的目的。同全国各地一样，当时的汕头市已成立了一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抗敌后援会”，这是一个官方组织，名义上由党政军三方代表组成，实际上是由国民党的汕头市党部操纵，执行汕头市党部限制抗日

救亡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接受我党指示而进入一五五师政训处工作的张其光同志（1939年5月参加共产党），最初向陈特向、林伟民等表示，“青救会”名称不能改。但从实际出发作了让步，主张名称可改为“青年抗敌同志会”，而反共顽固派陈特向之流鉴于张其光当时仍有很大权力，也表示让步，双方同意“青救会”改为“青抗会”，继续保存这个青年的战斗组织。

1938年1月15日，汕头青救会和潮汕各地青救会在汕头的同济中学开代表大会，讨论成立“岭东青救总会”和国民党市党部所提改变名称的问题。国民党方面派了大批武装警察，前来干扰，迫使大会提前结束。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无理压制，当天晚上，汕头青救会和各地青救会代表，动员群众，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给了反共顽固派一个有力的警告。

在双方剑拔弩张的险恶形势下，党的领导及时出来扭转局势，指出在成立“岭青总会”的问题上，必须克服过左的情绪，继续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在改变青救会名称的问题上，要善于让步，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避免破裂，以利今后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一·一五”大会后，1938年1月18日，汕头青救会举行会议，正式通过改名为“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与此同时，各地“青救会”也改名为“青抗会”。

关于改变名称的问题，在汕头青抗会内部也曾引起一场争论，主张改与不改的双方相持不下。最后在党的领导下，展开讨论，党员、干部在讨论中提高了认识：“改名”不等于“易帜”，名称改变了，立场可以不变，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环境和条件不同，组织形式也不能一模一样。就某种意义说，改变名称反而可以加强这个组织的公开合法地位，对斗争更有利。统一了认识，大家一致同意把名称改为“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经过这场讨论，提高了大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的认识，不过“左”的思想，模仿解放区的做法，仍时有发现。如1938年8月间，汕头青抗会的一些负责同志，竟把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搬过来，作为汕头青抗会的会训，大字书写，张贴在会议室的墙上。象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唯恐对方不知自己戴上红帽子的做法，当然很不适当。但是反过来说，当时能够这样做，也说明汕头青抗会改变名称后，并没有因而丧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至于汕头青抗会和“抗敌后援会”的关系，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统属，实际上汕头青抗会并不向它请示和报告工作，也不受他们那一套的束缚。相反的，它对来自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和抗敌后援会的种种无理压制，始终采取抗争和不屈的态度。

（三）汕头青抗会成立初期的活动

汕头青抗会一成立，全体会员就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活动，扩大影响。不久，市内各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都能看到汕头青抗会用浓墨书写的大字标语和用彩笔画

成的巨幅宣传画，为这个海港城市增添了抗战的气氛。

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沉睡中的汕头市民，就会被雄壮的抗战歌声和有力的口号声惊醒。这便是汕头青抗会的“晨呼队”（即义勇队）在歌唱，在呼唤。这种“晨呼队”是由自愿参加的几十个男女会员组成的队伍，他们每天早晨都要走遍大街小巷，用抗战救亡的歌声和口号声，唤醒沉睡中的人们。他们要唤醒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自身的解放；他们要惊醒沉醉在红灯绿酒、清歌妙舞之中，不知亡国恨的男女们，使他们认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为拯救民族危亡出一分力。晨呼队好似黑夜里的号角，催人去出征！他们的歌声响彻云霄，他们的口号声震撼大地。这样的晨呼队每天早晨都要出动好几个，分别在市内的东西南北同时进行。然后，各路晨呼队一齐集合到公园里，进行军训。军训后，便聚集到公园的树下，学唱新歌，读报、讲解时事，讨论各战场抗战的新形势，学习抗战中的战略战术和工作方针、政策。在公园里进行这些活动时，经常吸引着大批游客来听讲和参加学习。

白天，汕头的大街上，常有一队队汕头青抗会的宣传队，歌咏队出现。他们在讲演、歌唱、宣传抗战，有时还能看到雄壮的汕头青抗会游行队伍，在大街上阔步前进。他们八人一排，手挽着手，昂首挺胸，引吭高歌。伴随着悲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歌声的，是坚定整齐的步伐。

1937年8月下旬，汕头青抗会为了支援邻县的兄弟组织，促进潮汕的抗日救亡活动，曾经两次离汕外出活动。一次到潮安，一次到澄海，两次都和当地的同志举行联谊，并配合进行宣传活动，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和团结。

汕头青抗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组织不断发展，会员人数大量增加，这就产生了对新同志的团结与教育的问题。

新参加的会员同志，多数是受抗战影响，上不了学的青年学生和教不成书的小教人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在海外的归侨青年。这些同志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有爱国爱乡的思想。他们的生活受到抗战的冲击，开始从朦胧走向觉醒。但他们缺乏终身为革命奋斗的理想，因此，人虽入了会，思想却还在彷徨中。为了团结这部分新同志，汕头青抗会作了很大的努力。适当调整组织，把新老同志编在一起，加强了组织领导，增加政治学习，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开展文体体育活动以适应青年的特点，尽力使这些同志和组织紧密联系起来。为了使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还经常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让老同志带着干。到澄海和潮安的那两次联谊与宣传活动，使汕头青抗会的新老同志，都受到很好的锻炼。为了解决同志们生活困难，汕头青抗会安排了宿舍，给没有家庭在汕头的同志住宿，还开办伙食，解决专职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

汕头青抗会这个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有曾应之、陈光、王亚夫、周礼平、饶东（以后入党的）和女干部方东平，王勘等同志。这些同志，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